

· 天津文史参考资料简辑之十六

国民党C.C.法西斯组织 罪恶活动述略

(内部参考)

天津市政协秘书处编印

一九七八年三月

说 明

这篇资料是根据征集的几篇叙述有关国民党C.C.组织活动的文史资料未刊稿,及参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发表的C.C.组织内幕资料,并参照其它一些有关资料,加以印证充实,整理而成,在整理时我们尽可能去伪存真,力求翔实。但由于资料不多,同时限于水平,错误缺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批评指正。

目 录

说 明

(一) C.C.的由来及其派系的形成	1
(二) C.C.内部的核心组织与活动	3
1. “青白团”和“同志会”	3
2. 张厉生在华北的罪恶活动	7
3. 南京“聆训”	9
4. “训导班”	10
5. “同志会”的解散	13
(三) C.C.的外围组织	15
1.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15
2.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	17
3. 诚社	17
4. 中国青年励志会	19
5. 其它外围组织	20
(四) C.C.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	21
(五) C.C.向国民党政权行政、文教、经济部门的渗透	26
1. C.C.向全国行政、文教部门的渗透	26
2. C.C.向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门的渗透	31
(1)中国农民银行	32

(2)中央合作金库	33
(3)中央信托局及其它金融机构	34
(4)C.C.控制和侵占的工商企业	35
结束语	38

(一) C.C.的由来及其派系的形成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不久，一度被迫下野。国民党中央政府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所把持。国民党内戴季陶、丁惟汾、朱家骅及陈果夫等拥蒋分子，以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名，在上海结成一个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简称C.C.，这就是C.C.名称的由来。

中央俱乐部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江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肖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在上海展开活动，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责主持。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陆续加入，逐渐形成一个一百几十人的帮派集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职。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名义，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到南京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活动，中央俱乐部便由陈果夫一人主持。

蒋介石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副部长陈果夫负实际责任。这时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占有优势地位，而中央俱乐部的许多成员也分赴各地工作，因此中央俱乐部的活动遂逐渐停止。但曾经环聚在陈果夫周围的这一伙人，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团性的派系组织。这个派系，一直被人沿袭旧称，称为C.C.。

以二陈为核心的C.C.集团，是国民党的一个法西斯组织，是

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党务活动的嫡属派系,C.C.的活动基础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中央组织部,C.C.控制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党部的活动和人事。

由于蒋介石、二陈把持着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不仅直接操纵着各地方的党部,也控驭着很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陈立夫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使C.C.成员的活动范围愈加扩展,操纵控制的部门愈加广泛。因此有人便把C.C.解释成为二陈的简称(二陈的英文字头缩写也是C.C.)。

最早组成中央俱乐部的主要任务,如前所述,一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内的其它派系,如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新国民党等;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对付共产党。但随着蒋介石统治范围的扩大,C.C.的活动也愈来愈侧重于反共方面。至于C.C.和国民党内其它派系的矛盾,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不是C.C.活动的主要内容了。

(二) C.C.内部的核心组织与活动

1. “青白团”和“同志会”

C.C.是国民党的一个法西斯派系集团,其内部还有两个核心组织,一是“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节节失利。国民党内其它派系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活动,也没有停止。一九三三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队方面负责政训工作的主要头目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人,及搞党务活动的C.C.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七人,斥责他们搞的反革命活动没有显著效果,既对付不了共产党,也没有消除国民党内其它派系的掣肘。因此责成他们在国民党内分别成立秘密小组织,其目的是以秘密组织的形式,拉拢一批坚决拥护他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拥护他在政治军事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的“忠实”分子,以加强他的个人威信和统治势力。

陈果夫等七个C.C.头目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后,即朝夕聚议,商量小组织的名称,并草拟章程。他们派遣张冲、张北海、罗学谦等人去德、意两国考察希特勒、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组织的情况。最后决定仿效德、意法西斯组织的模式,成立两个小组织,一是“青白团”,一是“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并以“青白团”为

核心组织。实际上，团和会是二而一的东西。

“青白团”和“同志会”的组织章程及政治纲领大同小异。章程的开宗明义第一条都载明参加者坚决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终身不渝。至于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则是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

“青白团”和“同志会”的中央组织机构是一套人马。事实上“青白团”成立不久，即行撤消，成员也并不多。

“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组织，是推蒋介石为首，称之为最高领袖，在南京设立中央干事会。陈果夫任干事长，干事会成员有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曾养甫、洪兰友、余井塘、徐恩曾、程天放、洪陆东、赵棣华、陈肇英、苗培成、陈泮岭、李敬斋、潘公展、吴开先、闻亦有、谢作民、叶秀峰、梅公任、肖铮、方治、赖琏、王祺等，此外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中，凡属C.C.分子多属“同志会”中央干事会成员。干事会设有中央常务干事五人：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另由中央干事会指派一些中央干事，以特派员的名义分区负责，到各省市去发展“同志会”的组织，例如程天放负责江西，苗培成负责安徽、山西、绥远，曾养甫负责两广，赖琏负责湖南、福建，张道藩负责浙江、上海，余井塘负责江苏、湖北，张厉生负责华北等。

同时还指派一些中央干事，在不同工作部门负责指导发展组织，如叶秀峰之于文化，徐恩曾之于调查（即特务工作），赵棣华之于财政，闻亦有之于会计，肖铮之于地政经济，郑异之于政治外交等。

中央干事会还设有书记长，由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即中央组织部）主任秘书洪兰友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组织科的总干

事洪陆东、骆美奂，即在“同志会”中央干事会辅助洪兰友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张厉生继陈立夫任中央组织部长，“同志会”的人事也相应有所变动。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仍由洪兰友担任，而中央干事会的办事地址则迁至洪兰友私宅，表面上将“同志会”的指挥机关和中央组织部划分开来。另由张厉生调派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处总干事潘涯（浙江青田人）、党务视察员林品石（浙江平阳人）、北平诚社的李白虹（四川合江人）、河北省党部的林光耀（广东人）等到“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工作，以接替洪陆东、骆美奂等人。

另外，还由中央政治学校编辑出版《政治评论》，作为“同志会”的喉舌，宣传“同志会”的政治纲领，主编为程瑞霖。

“同志会”在各省市都设有分会，分会亦设干事长、副干事长各一人，干事若干人，由省市县党部委员中之“忠诚可靠”的“同志会”成员充当。如浙江省的负责人是罗霞天，北平市是陈石泉，河南是陈泮岭，山东是李文斋，广东是余俊贤，湖北是艾毓英，福建是陈肇英，山西是苗培成，安徽是方治，江苏是马元放，天津是邵汉元，上海是吴开先，汉口是李翼中等。其基层组织为小组，包括组员五至十五人，互推组长、副组长各一人。

参加“同志会”和“青白团”的手续和仪式，都充满封建神秘色彩，俨然与秘密帮会相仿。例如一九三三年夏，胡梦华参加“青白团”和“同志会”时，先由张厉生（公开身分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华北党务特派员）与胡梦华谈话，说明“青白团”、“同志会”组织源起和任务，并谓“青白团”是“同志会”核心组织，在华北只吸收六十人，胡是六十人之一，以表示对胡之器重。随后由张指定陈访先（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常委）充当胡的介绍人和监誓

人，在陈的家里举行入会和宣誓手续。

在陈访先的家里，辟出一间静室，室内光线幽暗，靠墙放置一张铺有红毯的香案，案上一对红烛高烧，墙上悬挂蒋介石和孙中山的像片。屋内只有陈、胡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烛光暗淡摇曳，构成一种神秘阴森的气氛。首先由陈访先发给“青白团”和“同志会”的章程（三十二开小本子）各一册，又发给入团、入会表格一式二纸各一份，命胡即时填写，填毕签名盖章，立刻交还。然后再给胡一份誓词，叫胡肃立在蒋介石的像前，举右手，读誓词，宣誓入团入会，由陈在旁肃立监誓。宣誓毕，胡在誓词上签名盖章，仍旧交还。所填表格内容，主要为本人详历和志愿。誓词则是表明甘愿竭尽忠诚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终身以之，如果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处分。表格和誓词交还后，须逐级上报，除登记保管外，还须备一份副册呈报蒋介石核阅。

“同志会”和“青白团”的保密程度相当严格，甚至成员之间如非必要，也禁止发生横的关系，除在一个基层小组的成员以外，一般都不暴露其会员身分。例如胡梦华是河北省的“同志会”员，胡寄南是南京市的“同志会”员，两个人同时在南京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中充当训导员一年之久，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同志会”的成员。于此可见其保密情况之一斑。

“同志会”吸收的对象，是对蒋介石表示极端“忠诚”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委员和经过挑选的国民党员，因此参加同志会的先决条件，首先是须具备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一般手续，是由所在地国民党区分部党员二人介绍，经党员大会通过，逐级上报上级党部核准。发给党证，需要很长时间。二陈为了给“同志会”招

兵买马，给C.C.壮大声势，多拉一些“社会名流”入会，就通过“中央特许入党”的捷径，使这些“社会名流”迅速具备国民党员的身分。只要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取得中央特许入党登记表，照章填写，再找两个中央委员介绍，交中央组织部审核通过，即可及时发给注有“特”字（中央特许之意）的党证，手续非常简易便捷。这样，有些思想反动、拥蒋反共而被C.C.看中的“社会名流”，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拉入国民党，随后不久即可参加“同志会”。

在“同志会”分派各地的特派指导员的指使之下，各省市的国民党部都派有专人插手各个部门，搞反动宣传，进行组织拉拢。他们插手的部门包括大学、中学、小学、文化科学、农业、工业、商业、政治外交、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调查情报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每一部门都由“同志会”中央干事会指定专人撰写指导通讯，发给各省市负责该部门的党部委员，作为宣传吹嘘和组织拉拢的理论根据。

2. 张厉生在华北的罪恶活动

张厉生是“同志会”华北区的特派指导员，他于一九三三年春到北平，首先组成了河北省干事分会。河北省干事分会的干事长是陈访先，副干事长是李嗣璁（荫翹，河北广宗人），连同胡梦华三人为常务干事。其它分会干事都是国民党河北省的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计有：詹朝阳（梧生、广东人，中统头子）、王玉宾（河北邢台人）、阎振熙（河北清苑人）、杜松延（河北庆云人）、许惠东（武清人，中统特务）、刘子麟（顺义人）、史贯一（河北定兴人，中统）等。为了吸收河北省各县党部委员及一般党员参加“同志会”，陈访先虚设了“敬业学社”与“乐群学社”两个徒具

名称、实际并不存在的外围组织。对拟予吸收对象，先作个别谈话，考查他对于拥护蒋介石法西斯独裁和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忠诚”程度，认为合格，就让他填写参加敬业学社或乐群学社的表格，观察六个月后，再进一步填表宣誓参加“同志会”。他指定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干事黄樾荪（湖北黄陂人）、监委录事车士彬（昌平县人），协助他审核整理两个虚设学社的表格。

与此同时，张厉生还指使陈访先约集国民党冀、察、平、津、平绥、北宁六省、市、路党部，自东北流亡入关的辽、吉、黑、热四省党部，及不容于阎锡山的晋、绥两省党部——号称华北十二省、市、路党部委员，每两周集会一次，共同策划如何进行反共，研讨怎样排挤汪（精卫）、胡（汉民）等反蒋的派系。每两星期的星期六下午在北平旧司法部街河北省党部举行集会。届期张厉生亲自到会，会前必对陈访先指示集会日程。辽宁省党部常委兼北平市电话局长徐箴（士达、沈阳人）亦常在场参与机要。参加集会的人有河北省党部执监委员（包括“同志会”河北省干事分会全体干事）；北平市党部委员陈石泉、董霖、牟震东（浙江黄岩人）、鲁荡平、宋振渠（安徽人）、郭登敖（贵州人）、方少云（广东人）、许孝炎（湖南人）；天津市党部委员时子周（天津人）、邵汉元（辽宁人）、刘不同（辽宁人）、马亮（辽宁人）、童耀华（江苏盐城人）、陈一郎（浙江人）；东北四省党部委员徐箴、梅公任（佛光、辽宁人）、王宪章（吉林）、卞宗孟（吉林）、王秉钧（黑龙江）、吴焕章（吉林）、石九龄（热河）；晋、绥党部委员姚大海、韩克温、李敏、刘冠儒、赵谊斋；北宁铁路党部委员曾三省（广东人）、单成仪（辽宁人）；平绥铁路党部委员陈宗周（广东人）、王逸民（河北容城人）、刘桂（复斋、山西人）等。

一九三四年秋，“同志会”北平市分会副干事长董霖，曾两次约集张厉生、陈访先、胡梦华以及北平教育界的一些“名流”徐诵明、刘运筹、贾成章、吴祥凤、刘拓、顾毓琇、杨开道等聚会，策划如何在北平各大学组织“同志会”的外围组织，准备吸收某些思想反动的教师入会，同时阴谋解聘某些思想进步的教师。在谈到准备解聘北平大学法学院某些教授时，徐诵明说这些人都是法学院院长白鹏飞推荐的，他可能有异议。张厉生恶狠狠地说：“如果白鹏飞坚持异议，就把他也列入‘解聘’名单”。

在这期间，由张厉生每月资助经费四百元，交杨开道，在北平主编出版过一种《人文杂志》，内容主要是拥护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并用欧美反动的政党理论和历史人物加以论证，前后共出版五、六期。

3. 南京“聆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发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急与蒋介石、汪精卫密议对策，由蒋介石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施以压力，妄图以此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所谓“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出席者为各省市的教育厅、局长，大专院校校长，及其推选的教授代表三人，学生代表一人。汪精卫这时因遇刺出国养伤，蒋介石以代行政院长，主持“聆训”会议，其“训词”略谓：今学生反日，“殊不知国民党是一贯反日的。”日本有亡华的“满蒙政策”，而“先总理”孙中山有“高台政策”（即不忘甲午之耻，必

须收复高丽、台湾)。对于孙中山的“遗策”，他蒋介石“无日或忘。”惟目前“绌于国力”，不得不“忍辱负重”。当前“学生运动及其幕后策动者鼠目寸光”，“燕雀安知鸿鹄志”。随后他吹牛说，他不仅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高丽、台湾”。但话风一转，立刻又拉回来说，“不过绌于国力，今非其时。”他无耻地诡辩吹嘘一通之后，最后诿责于人，攻击共产党爱国有罪，诬蔑共产党抗日救国“必将导致亡国”，由此归结到“攘外必先安内”，“救国必先反共”。他责成出席代表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回去为之传播，应对学生“切实晓喻。”

配合“聆训”会议，“同志会”立刻在南京高家酒店秘密会址召开中央干事会扩大会议，积极策划破坏学生运动的阴谋。会后，推举潘公展（上海教育局长）、叶溯中（浙江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山东省教育厅长）及胡梦华等，由陈果夫率领，“晋謁”蒋介石献策。胡梦华向蒋介石献策说，破坏学生运动最根本的办法，莫过于遴选一位有才能的、最忠于领袖独裁的教育部长，配合各省市党部，对大专院校进行“整肃”，根本不聘请那些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人充当教授，学生无人鼓动，学潮自然波平浪静了。只有这样从根本上解决，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4. “训导班”

为了配合“聆训”会议的要求，从各方面破坏学生运动，由蒋介石提议在行政院下附设一个“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简称“训导班”），其目的是以就业为诱饵，以训导为手段，一方面在学生队伍中进行分化瓦解活动，一方面借此培训一批

效忠国民党蒋介石、堪为利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毕业即失业，大学毕业生寻找职业非常困难，国民党反动政府利用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学生心理，开办这样的训导班，诱骗青年走向反动，破坏学生爱国运动，其用心极其恶毒。

训导班分两期调训一九三六年夏季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每期训练四个月。第一期自一九三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二期自一九三七年三月至六月，授以反动理论和所谓业务知识。训练毕由行政院统一分配各部、会、署和各省市政府以委任官使用。班址借用南京红纸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课堂及其朝天宫的宿舍。

训导班上设指导委员会，蒋介石兼充会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丁惟汾、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三人为该会常委；行政院其它各部、会、署的头子为该会委员。设立这样一个徒具虚名的委员会，是为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表示对于训导班的学员异常重视之意。

训导班的教育长由丁惟汾兼充，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教务处负责安排各种课程，由王凤喈（湖南人，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副主任）兼充教务处主任。其业务知识课程，由行政院各部、会、署的高级官员讲授。

训导处负责掌握学员的政治思想动态和进行训导工作，是训导班的中心，也是由 C.C. 分子直接控制的部门。训导处主任由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兼充，副主任由国民党中委陈访先充任。下设三大组，九小组，每组设训育指导员一人：

第一训导大组主任指导员，先是李寿雍（江苏盐城人），后为郑震宇（福建闽侯人）。

第一小组训育指导员 郑震宇兼

第二小组训育指导员 王立亭（山东人）

第三小组训育指导员 张道行（江苏常熟人）

第二训导大组主任指导员陈访先兼

第四小组训育指导员 刘瑶章（河北安新人）

第五小组训育指导员 张道行

第六小组训育指导员 章柳泉（安徽泾县人）

第三训导大组主任指导员胡寄南（江苏无锡人）

第七小组训育指导员 胡寄南兼

第八小组训育指导员 赵宝全（江苏江阴人）

第九小组训育指导员 胡梦华（安徽绩溪人）

女生管理员 顾谷若（江苏无锡人）

训育指导员的任务是审阅学员所写自传，与学员个别谈话，指导小组讨论会。于每星期一、三、五晚七至九时进行工作。

总务处管理学生生活及主持军事训练，主任由吴挹峰（浙江吴兴人，中央政治学校总务主任）兼充。军事训练设总队部，吴璋璞（浙江吴兴人，中央政治学校军训总队副）任总队长。下设三个大队，九个区队。每期学员约六百人，每个大队约二百人，每个区队约六十多人，与训导大组、小组的人数，适相配合。军训大队的队长、队副，都是中央军校毕业生，大多为复兴社分子。

“同志会”自然不会放过训导班发展组织的机会，曾在该班设立分会，指派张厉生、陈访先、吴挹峰三人为分会干事，并指定陈访先负责审核、吸收该班学员为“同志会”员。陈访先规定，每学期的最后一月，即一九三七年一月和六月，由训导处干事杜维涛（芜湖人）、助理干事孔宪潭（河北饶阳人）传知训育指导员开列各小组“优秀分子”（即思想反动分子）名单，交他审核，以决定

吸收与否。凡决定吸收者，经张厉生、吴挹峰同意，汇报陈果夫批准，然后到南京城北三牌楼紫竹林庙宇大堂，举行集体宣誓入会。为了给“同志会”发展组织准备条件，训导班的全体学员都曾在该班大课堂举行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预先取得了国民党员的身分。

5. “同志会”的解散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逃到武汉，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珞珈山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操纵大会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因此宣布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以适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彻底实行独裁统治的新局面。一九三八年四月，陈果夫在汉口国民党市党部召集参加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志会”的成员约四、五百人。过去由于组织保密，“同志会”成员之间互不相知，这时才彼此公开身分，其实大都互相熟稔。陈果夫当场宣布，最初组织“同志会”的目的，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现在蒋已被举为国民党总裁，使命已经完成；另一目的是反共安内，现在抗日军兴，国共两党又开始合作，这一使命也算是结束了。因此遵照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同志会”自即日起宣布解散（“青白团”早已撤消，不再提及），有关刊物停止编辑出版，经费停发。

在表面上，“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这个C.C.内部的组织，从此好象不再存在了。可是作为派系集团的C.C.组织，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活动。而且C.C.分子向政府机构、经济部门的渗透活动，比以前更加深入、广泛。甚至某些宣传“同志会”政治纲领的出版物，例如上海陶百川主编的《血路》、西安白宝瑾主编的《西北评论》等，也仍在领取经费，继续出版。而后来由于蒋介石日益推行假抗